

旅日中國學者的雙語困惑

● 毛丹青

今年5月19日的《日本經濟新聞》刊登了一篇編輯委員的署名文章，題為〈在日中國學者的連帶網絡〉。該文對近年中國學者在日本的活躍情況表示了讚賞，同時也指出以下兩個特點：一是與早期知日派魯迅、郭沫若、廖承志回國後用中文表達日本不同，目前的旅日中國學者多用日語撰稿發言；二是這批學者分成「新三屆」與「六八式」兩大勢力。所謂「新三屆」是指恢復高考後的1977年到1979年入學的本科生，而「六八式」指的是出生於60年代，在8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青一代，這批人如今正是而立之年。

其實，這類分析從去年開始就在中國的文化界沸沸揚揚，並有北京女學者鍾岩的專著《中國新三級學人》問世，引人注目。尤其今年又是恢復高考二十周年，如何觀察不同年代的學人風格，就成為了解目前中國社會的一條途徑。從這層意義上講，《日本經濟新聞》的文章對中國學界的把握是準確的，而且該文引用段躍中先生的統計資料也很有說服力。旅日中國學者在學會、院校、影視界的空前活躍，改變了日本人心目中專靠「三把刀」（菜刀、剪刀、剃頭刀）創業的舊華僑形象。中國學者們的日文文筆經由日本人的編輯潤飾後變得流暢，而

且他們的口語能力強，與日本人的公開辯論也不示弱，比如：朱建榮與中嶋嶺雄兩位教授的電視論壇即是一例。這些自然有助於在日本建立中國人的形象，其影響是積極的。可以說，這也是改革開放的中國推進留學政策的一大成果，使原先的留學生如今登堂入室，在鄰邦社會形成一派氣象。

不過，僅以上述概觀而論，似乎還有一部分潛台詞讀不出來，尤其令人擔憂的問題是有必要提出來的。為此，我不揣淺陋，談談以下看法。

一 關於旅日學者的日文撰稿著書

對那些在日本安身立命的中國學者來說，評論他們用日文寫作也許過於苛求。但拋開個人的喜好不談，他們用日文著書大部分是為了滿足日本的輿論需求，別無更深的理由。據統計：從學術領域來看，有關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等學科方面，旅日學者的日文著述激增，尤其在鄧小平去世後，有關中國政局的著述論稿紛紛刊行，這無疑是與日本讀者市場的傾向緊密聯繫的。今年初，中國新疆出現暴亂，北京西單大街又發生爆炸事件，

日本輿論對中國的關心也日益升級。這時，著名雜誌《中央公論》發表了神戶大學副教授王柯博士的長篇論文，對新疆少數民族問題作出詳細的分析。王博士是一位曾經在當地下放四年的中國學者，日本雜誌需要他所掌握的資料以及他熟知現場的論述，這是很容易理解的。不過也有相反的例子。1995年是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，日本輿論界對戰爭責任的報導一直採取低調，但到了9月份，《朝日新聞》卻發表了一位旅日學者的投稿，文中提到希望中國也要自省。這篇文章頓時在華人社群中引起極大的憤慨，不少華文報紙對這位畢業於東京大學的中國博士也口誅筆伐，轟動一時。從文章內容來看，作者本人並無惡意，只希望中國能夠自強，但在當時日本的輿論環境下，他的好意是無法在日本報紙上表達的，所以留學生和旅日華人的憤怒，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日本輿論的一次抗議。類似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，最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翻譯出版的本澤二郎著《中國的大警告》就是一例。誠然，專心治學是旅日學者的主要目的，但不可否認的是，他們對中國的看法與評論往往最能吸引日本人的注意，這既是日本輿論所需，也是為甚麼多數旅日學者能夠成為中國問題評論家的原因所在①。

二 中國對日本的研究和旅日學者的作用

與旅日學者研究中國問題能在日本容易嶄露頭角相反，這些年中國有關日本問題的研究仍然是落後的，至少在日本文化論著方面，能夠得到學界公認的作品恐怕還是20年代戴季陶的《日本論》。根據年初東京國際書展的報告，中國的大出版社在20年間出

版的有關日本文化研究的專著平均不超過三本。在中國，無論是雜誌報刊還是專著譯作，相對於歐美研究，日本題目的刊出次數少得可憐，如果不細心留意，讀者很難找到有關文章和書籍。因此，這裏出現了一個怪現象。一方面，旅日學者在日本學界非常活躍，而另一方面，中國對日本的研究本來最需要前沿學者的積極參與和發言，但卻不見他們的動靜，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。換句話說，旅日學者用日文撰稿著書對自己的國家大發議論的時候，實際上就等於消耗着他們作為中國人觀察日本的本能。或許他們也想細心觀察日本，但畢竟不如討論中國這個大話題有反響，於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就跳入了中國論壇的陣地，在鄰邦排演了一部中國人大唱中國的戲②。因此，中國的日本研究需要旅日學者投入的願望就不那麼容易達到了，這實在是一件可悲的事情。就目前的狀況來看，越來越多的旅日學者進入日本學界、院校、影視界等等，他們以專家的身分替日本分析中國問題，而且還是從內部、從自己的親身體驗談起。無疑，這對於一向注重吸收外來文化的日本來說，更能夠從對方活生生的解說中獲取他們的感想、領悟乃至有關籌劃……。我擔心這樣下去，日本會越來越了解中國，而中國則越來越不了解日本。相比之下，我們的前輩知日派之於今日中國的意義是深刻的，這值得我們深思。

三 呼籲為旅日學者創造用母語著書的環境

旅日學者用日文寫作的建樹較他們用母語為國內寫作為多，這固然是由於這些學者已經在日本安家落戶，

既要維持家庭生計，又要以日文作為公共語言，為晉升副教授、教授而奮鬥。就這一點而言，責怪他們使用日文做學術發表是不公平的，但若要求他們為國內撰稿出書，則需要付出一定的關懷。首先，作為中國的輿論界應該重視這批久居鄰邦的學者，與他們建立一種連帶網絡，相互促進對日本問題的研究，從戰略的角度觀察日本，繼承前輩知日派的工作。儘管中日兩國的生活水平還有差距，具體到撰稿出書的稿酬問題，旅日學者容易向日本的出版商一邊倒，但如果經過大家的努力，把日本提升成為中國普遍關心的對象，那麼有關日本的中文論著就會贏得比日本更大的中國讀者市場，作者也會獲得相應的收入。這裏關鍵的問題似乎並不是中日兩國的經濟懸殊，而是中國對日本的關心程度究竟能否提高。至少就目前階段，從書籍出版而言，相對於「中國熱」的日本，中國卻是「日本冷」。東京大學博士生夏冰寫的《日本如何面對中國》一書曾經在日本《留學生新聞》連載，並受到旅日學者的廣泛好評，她本人最先希望由國內出版，但卻遭冷遇，理由是「中國的事你管日本人怎麼說」，由此不難看出中國出版單位的對日態度。當然，同樣是物美價廉的電器產品，如果是“Made in Japan”，那麼他們的態度也許會緩和一些，但令人擔憂的是在對待無形文化的態度上，我們總是一知半解，甚至是根本不解。這樣的教訓，近代中國的歷史恐怕就是一個見證。

四 結 語

本文開頭提到了旅日學者的年代差，實際上這也是他們的中國圖式在鄰邦學界的如實映照。從這一點看，

旅日學者的中國情結至今仍然存在，無論是客居異鄉，還是落地生根，他們都必將繼續今後的發展。但同時，如何克服日本對旅日學者的功利需求，又如何使這批新的知日派真正發揮作用，為中國的日本研究做出貢獻，這恐怕不是一個單純的認識方法，而是中國人的認識意識的問題，這尤其需要中國知識界的關心。

試想，百年中國，面對日本對我們的研究以及類似於「大陸浪人」留下的有關中國的大量日記，我們到底有多少像他們一樣的母語記述，又有多少腳踏實地的了解呢？古人講究「知己知彼」，而目前旅日學者在雙語的困惑中，如果出於上述的若干理由，一味在鄰邦用日本腔唱中國戲的話，恐怕難於做到「知彼」，最終甚至連「知己」的本領也會丟掉。

這實在值得警惕啊！

註釋

① 當然，這還涉及到中國尚未具備能夠自由而充分地討論政治的學術氣候，同時，日本的某些大學以及研究機構對中國史料的掌握、資料的收集都做得十分出色，這也使旅日學者如魚得水。加之，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後冠之以「東洋」學問的研究，注重基礎資料的積累以及記述史學的強調，因此，旅日學者對日本更具有實用的意義。

② 今後幾年內，在擠入中國研究領域的旅日學者之間必將激化爭奪留日教職的競爭，這些學者能否建立真正意義上的連帶網絡，恐怕令人懷疑。

毛丹青 198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，後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。1987年起客居日本，在某國際貿易公司任職。譯著《禪與中國》、《歎異抄》，著有《發現日本蟲》等多部。